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 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为例

王桂新 武俊奎

提要: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是建设和谐城市、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如何缩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则成为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本文以上海为例建立了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则可以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体价值判断的趋同性,从而对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双向作用。如同群效应强化群体共同的偏见,则有扩大二者社会距离的倾向。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 本地居民 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 同群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告别赖以生存的土地迁入城市,在城市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二重身份,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对城市本地居民来说是外地人;他们拥有农业耕地却大多不再依靠种地为生,相比那些依旧终日耕作的农民来说他们又具有城里人的一些特点。这些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寻找更美好生活的农民工成了城市中的“边缘群体”。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土地改革不断深化,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增大。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一直是全国各地外出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区,到2008年底上海以农民工为绝对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已达642.27万人。

主要受“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

为“集中(形式)城市化”或“半城市化”。在这一城市化阶段,农民工迁入城市只是实现了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还没有实现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本质城市化”。这样,在同居一市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人口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这一社会距离体现了农民工在所居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王桂新等 2008)。“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王春光 2001)。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缩小、融入城市社会才能实现完全城市化。社会距离的缩小不仅有助于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性偏好强度,而且有助于改进互利协调效率以及社会规范的执行,从而提高自愿合作的效率(李英蕾、夏纪军 2009)。缩小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既能够使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完全市民化,又能够提高本地与外地劳动力之间的合作效率,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增长更有效率。因此,考察和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是缩小社会距离、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及市民化水平的基础和前提,对建设和谐城市、推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一般可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考察其市民化程度,看其市民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二是考察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看其距离市民“还有多大的差距”。王桂新等(2008)曾根据第一种视角考察了上海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发现2006年上海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接近60%。本文将根据第二种视角,从社会距离角度研究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

社会距离体现的是群体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体现出来的。本文选择从群体同质性和个体异质性角度分析造成社会距离的因素。群体同质性通过同群效应(peer effect)实现,个体异质性表现为个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差异。阿克洛夫(Akerlof, 1997)认为,传统经济学方法论基于个人主义,假设人都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因此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可以拓展到研究个人之间的交往决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不仅影响交往双方的价值观和偏好,而且其行为产生的外部性会影响其他人的交往决策。费斯汀格认为人们在评价自身行为时,如果缺乏现成的客观标准,一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

属性类似的群体进行比较 (Festinger, 1954)。同一群体成员间相互交往会影响彼此的决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从众心理使得群体内部成员更倾向于选择趋近群体内大部分人的选择。这时个人社会决策的效用函数是 $u = -d|\bar{x} - x| - ax^2 + bx + c$, 个人选择的 x 与群体内其他人的选择 \bar{x} 差距越大, 给个人效用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均衡时群体内部所有成员都选择, 这产生的是同群效应; 如果不同群体成员相互交往时, 由于群体之间存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偏见 (bias) 等差异, 个人选择的社会距离 x 往往大于社会最优的社会距离 \bar{x} 。此时, 个人决策的效用函数是 $u = -d(\bar{x} - x) - ax^2 + bx + c$, 个人与另一群体成员交往时选择的社会距离 x 越偏离 \bar{x} , 带给个人的效用越大, 这时产生的是社会距离 (Akerlof, 1997)。同群效应具有社会乘数的作用, 那么, 同群效应的社会乘数机制是如何传导的? 现有研究还没有考察同群效应对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 (Putnam et al., 1993)。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 (张爽等 2007), 而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的角度解释造成中国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间社会距离的微观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定性考察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对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间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 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距离的 Logit 模型:

$$\text{logit}(y_i) = \beta_0 + \beta_i(x_{ij}) + \varepsilon_{ij}$$

式中 y_i 为社会距离, x_{ij} 为考察的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2006 年 9 月上海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社会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是 15 岁以上的本地居民和上海市户籍人口以外的外来农民工。本次调查以家庭为单位, 每个家庭调查一个人。对本地人调查的有效问卷 667 份, 农民工调查的有效问卷 1026 份。上海市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农民工众多的大都市, 因此对上海市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调查研究具有代表性。

二、已有研究评述

(一) 社会距离的内涵

塔尔德 (Tarde, 1921/1890) 在《模仿法则》中最早使用“社会距离”

来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阶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一开始“社会距离”客观地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差异。此后,社会距离被用来表征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动等。齐美尔(Simmel,1964/1902)研究现代都市人关系冷淡、交往稀少、感情淡漠的生活状态时,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赋予了“社会距离”主观色彩,但是齐美尔并没有为“社会距离”给出具体定义。在齐美尔看来,社会距离既有客观的文化、教育、收入等距离,也有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等距离,既有个体之分也有群体之别。维拉德(Poole,1927)据此将社会距离细分为主观个体距离、客观个体距离、主观社会距离与客观社会距离。主观个体距离反映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偏见,客观个体距离指的是个人之间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差距、主观社会距离表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群体之间观念差异的来源、客观社会距离反映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在整体文化、收入等方面的差距。

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对社会距离进行了全面论述和剖析(Park,1950)。帕克用社会距离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亲近程度衡量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他为社会距离给出了具体定义:“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密的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帕克将距离分为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他认为,经济条件、职业和城市生活的特许权对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而且在城市社会中空间隔离和感情隔离是互相加强的。帕克在前人基础上将无形的社会距离与有形的空间距离结合起来剖析了社会距离产生原因。

社会距离是用于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抽象概念,反映了基于社会变量或社会网络的相似性或亲近度(Marshall,1998)。本文中的社会距离指的是社会群体之间亲密程度的主观距离,而不包括帕克分析的空间距离。本文将通过衡量城市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两大群体之间交友意愿的差异来考察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二) 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自从塔尔德指出社会距离的客观存在性之后,国外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距离的研究:齐美尔赋予了社会距离更多主观色彩,维拉德对社会距离进行了全面分类,帕克将无形距离和有形距离结合剖析

了社会距离的根源,博格达斯(Bogardus,1925)设计了社会距离考量表来测量社会距离。

关于社会距离产生的根源,不同学派有不同看法。较早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地位的差异如何导致社会距离。韦伯认为社会地位是导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社会地位差距越大的群体之间社会距离越大。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主张从客观存在的无形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受教育水平等角度解释群体之间相互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这个学派强调个人自我认同的“优越感”或者“自卑感”使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因素带来了群体之间交往的壁垒(Bell & Robinson,1980; Nosanchuk & Erickson,1985; Jasso & Milgrom,2004)。

以帕克为代表的空间阶层学派认为,社会各阶层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导致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Flanagan,1990)。不同学者又对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有的归因于市场经济(Sykora,1999),也有学者认为是政治力量使然(Topalov,1989)。这个学派的观点过分强调有形距离对无形距离的作用,很容易得出通过缩小空间距离能够缩小社会距离的政策结论。

贝农(Beynon,1936)发现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社会距离。最近的研究往往将社会距离等同于经济收入不平等,经济收入不平等是导致个人之间紧张或者敌对关系的主要原因(Hipp,2007; Morenoff et al.,2001)。很多研究将种族差异包括到社会距离的研究中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甚至将社会距离的测度等同于种族差异的测度(参见Bogardus,1947; Jargowsky,1996; Johnson & Marini,1998; Jones,1991; Portes,1984; Rosenbaum,1992; Verkuyten & Kinket,2000; Warner & Dennis,1970)。由此,有些学者(Canon & Mathews,1971; Evans & Giles,1986; Matthews & Westie,1966; Payne et al.,1974; Siegel & Shepherd,1959)也将社会距离定义为种族差异。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或者宗教信仰差异解释社会群体距离状况,认为文化差异造成了一些种族隔离或对立(Gullahorn & Loomis,1966)。

除了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空间分布的差异会导致群体的社会距离,埃尔德(Elder,1998)还发现个人所处的年龄阶段也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同一事件的想法差异很大,因此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从而产生社会距离。此外,婚姻状况和孩子数目也是社会距离的重要决定因素(Fischer,1982; Hipp &

Perrin 2009)。其他一些研究认为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影响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长大的人可能因为观念、文化的不同产生社会距离(Logan et al. 2002)。

综上所述,影响社会距离的因素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地位、种族差异、年龄阶段、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 关于国内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研究

虽然国外学者发展出来的社会距离理论能够合理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的共性部分,但具体到中国城市中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些理论并不能给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解释。针对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中国的许多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首先,客观存在的制度屏障——户籍制度人为割裂了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制度条件下,外来农民工无法在政治权益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同样条件下农民工的报酬也比本地居民少(王桂新等 2008)。户籍制度屏障增加了农民工生活、子女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成本,其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本地居民(任远、邬民乐 2006),户籍制度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另外,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分隔,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更加不信任其他人(汪汇等 2009)。其次,外来移民还会受到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因此他们可能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李强,1995);由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各地方言甚至同一城市与郊区的语言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方言也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王春光 2001)。最后,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存在就业替代的竞争关系(王桂新、沈建法 2001),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导致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和歧视,影响了本地居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朱力, 2001)。制度、文化、语言、本地居民的偏见等原因又可能造成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缺乏交流(杜鹃等 2008),这些原因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本地居民提供的社会资本比例较低,社会资本的匮乏和质量低下影响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刘传江、周玲 2004)。另外,制度隔离、文化差异、社会偏见等使得农民工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的步伐(王春光 2001)。

上述诸多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我国城市农民工

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国是一个关系主导的社会而非完全的契约型社会,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的交往决策更容易受到所属社会网络(周围人“关系”)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对这种机制的深入考察;社会距离是通过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亲疏关系体现出来的,但以往研究却缺乏对个体异质性的系统研究。本文研究拟通过建立二元 logit 模型,控制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的客观变量(年龄、婚姻状况、性别、教育、收入、生养孩子数)和主观变量(偏见),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对二者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大小。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一) 假设与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的问题,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相关研究。

假设 I 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一个人如果拥有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那么其社会网络将更加广泛。如果本地居民社会网络中包括农民工,那么本地居民通过与其交往会更加了解农民工。两个群体彼此了解越深,越有助于缩小社会距离,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交友意愿也就越强烈。因此,我们以交友意愿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网络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logit}(\text{friend}_{ij}) &= \beta_0 + \beta_1 \text{social} - \text{net}_{ij} + \beta_2 x_{ij} + \varepsilon_{ij} \\ i &= 1, 2, \dots, n \\ j &= u, r \end{aligned} \quad (1)$$

x_{ij} 表示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性别、教育、收入、生养孩子数等。假设本地($j = u$)居民 i 是否选择与外来农民工交友主要取决于其社会网络中是否包含农民工。如果包含农民工,则本地居民可能通过与农民工更多接触了解他们,消除偏见,变得更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朋友。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包含本地居民时,如果与本地人口联系更加密切,那么这种交往可能改变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消除交友障碍。为了验证这个机制是否成立,我们加入了社会网络与偏见的交互项以及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定的交互项:

$$\begin{aligned} \text{logit}(\text{friend}_{i,j}) &= \beta_0 + \beta_1 \text{social} - \text{net}_{i,j} + \beta_2 \text{bias}_{i,j} + \beta_3 \text{social} - \text{net}_{i,j} \times \\ &\quad \text{bias}_{i,j} + \beta_4 \text{social} - \text{net}_{i,j} \times \text{identity}_{i,j} + \beta_5 x_{i,j} + \varepsilon_{i,j} \\ &\quad i = 1, 2, \dots, n \\ &\quad j = u, r \end{aligned} \quad (2)$$

假设社会网络中有农民工或者农村亲戚 ($\text{social} - \text{net}_{i,j} = 1$) 能够使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消除 ($\text{bias} = 1$, 没有偏见), 通过这种途径能够增进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 则模型(2)的 β_3 应该是正的。更多地接触本地人口使农民工更加了解上海城市生活习惯、文化等, 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如果这一机制成立的话, 拥有更加广泛和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转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农民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后会感觉自己是城里人而不是乡下人或城乡边缘人, 身份认同的转变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交友意愿, 那么 β_4 应该显著为正。

假设 II 同群效应容易扩大社会距离。

如果本地居民在进行交往决策时更容易受到周围同一群体内部成员的影响, 同群效应比较显著。假设同群效应的存在强化了个人的偏见, 本地居民将更不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为了验证这种机制是否成立, 我们引入偏见和同群效应的交互项, 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logit}(\text{friend}_{i,j}) &= \beta_0 + \beta_1 \text{social} - \text{net}_{i,j} + \beta_2 \text{bias}_{i,j} + \beta_3 \text{bias}_{i,j} \times \text{peer}_{i,j} \\ &\quad + \beta_4 \text{social} - \text{net}_{i,j} \times \text{bias}_{i,j} + \beta_5 x_{i,j} + \varepsilon_{i,j} \\ &\quad i = 1, 2, \dots, n \\ &\quad j = u, r \end{aligned} \quad (3)$$

假设同群效应的确强化了个人的偏见, 导致本地人口更不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 那么模型(3)的 β_3 应该显著为负。

(二) 变量描述

1. 社会距离。根据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 我们选择本地居民是否愿意与农民工交友来考量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本文考量社会距离的变量是虚拟变量, 当受访的本地人愿意时赋值 1, 不愿意或者无所谓时赋值为 0。^① 抽样调查显示, 上海市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

① 我们对问卷中“无所谓”的处理与汪汇等(2009)、李涛等(2008)相似, 将其归为不愿意的一类, 尽管可能夸大了不愿意交往人群的比例, 但是根据实际生活经验, 认为自己“无所谓”的本地居民在现实中如受到外来因素影响, 往往会倾向于不愿意与外来人口交往。

民工交朋友的占 30.18% 不愿意的占 69.82%。

根据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选择农民工是否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考量其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研究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当受访的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时赋值为 1,不愿意或者无所谓时赋值为 0。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愿意与本地居民交朋友的占 65.4%,不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占 34.6%。外来农民工更加愿意与上海本地居民交往,两个群体对社会距离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与卢国显(2007)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表 1 控制变量描述 (%)

本地居民		外来民工			
性别	男	47.2	性别	男	58.11
	女	52.8	性别	女	41.89
年龄	30 岁以下	23.5	年龄	30 岁以下	66.1
	30 到 45 岁	34.3		30 到 45 岁	30.5
	45 岁以上	42.1		45 岁以上	3.4
婚姻	未婚	13.5	婚姻	未婚	42.1
	已婚	86.5		已婚	57.9
教育水平	低(初中及以下)	25.6	教育水平	低(初中及以下)	52.5
	中(高中中专)	44.5		中(高中中专)	38.1
	高(大专以上)	29.9		高(大专以上)	9.4
工作状态	固定工作	87.7	工作状态	固定工作	56.9
	无固定工作	12.3		无固定工作	43.1
工作性质	低技能	18.4	工作性质	低技能	47.8
	高技能	81.6		高技能	52.2
收入	低(人均月收入 <750 元)	21.9	收入	低(人均月收入 <750 元)	17.6
	中(人均月收入 751-3000 元)	67.3		中(人均月收入 751-3000 元)	75.1
	高(人均月收入 >3000 元)	10.8		高(人均月收入 >3000 元)	7.3
迁入上海的第几代人	第一代	4.3	来上海时间	一年及以下	18.9
	第二代	18.4		一年到三年	28.7
	第三代及以上	77.2		三年及以上	52.4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外来人口调查资料 2006。

2. 社会资本。现有实证研究大多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取资源、信息的主要途径 (Grootaert, 1997), 在家庭和社区层面更是显著影响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 (张爽等, 2007)。调查研究的社会网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 一是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本文所获得的调查数据是基于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本地人口的社会网络体现在问卷中的问题设计是“您的家人或者亲友中有和外来农民工结婚的吗”。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则需回答“在您结交的朋友中有没有上海本地人”。调查发现, 31.5% 的本地居民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村人, 60.5% 的外来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包含上海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3. 同群效应。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同一群体中的成员个人做选择时往往以群体内部大部分人的选择做参照 (Festinger, 1954), 因此, 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互相影响就会产生同群效应。现有研究往往采用社区层面的数据研究同群效应, 因为我们的调查数据不能完全把本地居民归为不关注农民工的群体。如果周围的人不关注或者不愿意提及农民工问题, 则可能使问卷调查对象也对农民工比较漠然。调查数据显示, 16.2% 的上海本地居民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问题, 83.8% 的上海本地居民周围的人不关注农民工。

4. 偏见。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对对方所持的看法可能非常片面, 甚至是错误的。因此, 偏见或者歧视可能显著地影响群体间的交友意愿。偏见可能通过同群效应在社会交往中被传播和扩散, 也可能通过优化社会资本使群体之间通过相互交往接触增进了解而消除偏见。在调查问卷中通过设置“您认为现在社会犯罪增多与农民工有关系吗”来测量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 通过设置“您来上海后有没有受到上海本地人的歧视”来测量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偏见。严格地说, 通过这个变量衡量偏见并不十分全面准确, 但是也足以探测出社会交往中存在的偏见。调查发现, 80.7% 的本地居民认为社会犯罪增多与农民工有关系, 52.2% 的农民工感觉受到过上海本地居民的歧视。

5. 控制变量。除了以上我们关注的关键变量, 我们根据现有相关研究控制了影响社会距离的一些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收入、工作状态、工作性质、来沪时间等。统计结果表明, 农民工中青壮年占 96.6%, 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比例高于本地人口。

四、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以上考察,利用所建模型、变量及上海抽样调查资料,对上海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如下。

(一) 社会资本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机制

表2是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上海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的交友决策中的确发挥着显著作用。其他条件相同时,社会网络中没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仅仅相当于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人愿意交友概率的0.7(即 $e^{-0.353} = 0.7$)。同理,其他条件相同时,社会网络中有本地居民朋友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是社会网络中没有本地居民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交友发生概率的2.4倍。社会网络的确促进了本地人口和农民工相互交友的意愿,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确缩小了本地人口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此外,通过实证回归发现年龄、工作性质在外来农民工的交友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年龄对交友的影响呈U型曲线:一开始,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比数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当农民工到29岁左右时,他们的交友意愿的比数开始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低技能的农民工交友意愿不如高技能的农民工强烈。由于农民工与本地人口就业替代与竞争主要是在低技能工作领域(王桂新、沈建法,2001),就业竞争的原因可能使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友意愿降低。

迁沪时间长短和收入高低在本地人交友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上海定居时间长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要低于刚刚迁沪的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在上海定居时间越长的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比例越低,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也越大。收入在本地居民交友决策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人均月收入越低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越低。工作状态对本地居民交友意愿的影响虽然不很显著,但是方向也是正向的。就业竞争关系使得没有固定工作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低于有固定工作的本地居民。

表 2 模型(1)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农民工			本地人口		
	B	SE		B	SE
年龄	-.175 **	.081	年龄	-.043	.062
性别	-.002	.163	性别	.468 ***	.18
婚姻	-.028	.253	婚姻	-.319	.4
来沪时间	.043	.048	迁沪时间		
			time(1)	-.486 *	.278
			time(2)	-.641 **	.316
			time(3)	-.528	.34
教育	-.035	.031	教育	.021	.04
工作状态	.256	.166	工作状态	-.151	.313
工作性质	-.363 **	.188	工作性质	.133	.203
收入	0	0	收入		
			收入(1)	-.992 ***	.347
			收入(2)	-.731 ***	.272
孩子数	-.014	.149	孩子数	.109	.237
社会网络	-.864 ***	.167	社会网络	-.353 *	.189
年龄平方	.003 ***	.001	年龄平方	0	.001
Constant	3.515 ***	1.349	Constant	.964	1.546

注:(1)***、**、*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2)教育水平在回归中分别按照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和中专 12 年、大专 15 年、大学以上 16 年转换为连续变量。

(3)问卷中农民工来沪时间是一个连续变量,但是本地人口迁沪时间是用第几代来计算的分类变量。

(4)收入在问卷中同样出现了(3)中的问题,对农民工是连续变量,对本地人口是分段的分类变量。

表 3 是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偏见、身份认同等项后,社会网络仍然在交友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并且通过比较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影响强于对本地居民的影响。

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和本地人口对彼此的偏见,从而提高双方的交友意愿,缩小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这一机制是存在的。回归结果显示,没有偏见的外来农民工交友意愿更强烈,相同

表 3 模型(2)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农民工			本地居民		
	B	SE		B	SE
年龄	-.194 **	.086	年龄	-.009	.011
性别	-.061	.167	性别	.462	.18
婚姻	.016	.26	婚姻	-.177	.345
教育	-.055 *	.033	教育	.02	.04
来沪时间	.063	.049	迁沪时间		
			time(1)	-.429	.281
			time(2)	-.609 **	.318
			time(3)	-.5	.343
工作状态	.316 *	.17	工作状态	-.088	.311
工作性质	-.372 **	.192	工作性质	.092	.205
收入	0	0	收入		
			收入(1)	-.979 ***	.348
			收入(2)	-.711 ***	.273
孩子数	.033	.153	孩子数	.143	.238
年龄平方	.003 ***	.001	年龄平方	0	.001
偏见	.629 ***	.213	偏见	-.68 *	.367
社会网络 × 偏见	.169	.327	社会网络 × 偏见	.853 *	.461
身份认同	-1.1 ***	.336			
社会网络 × 身份认同	1.62 ***	.624			
Constant	4.96 ***	1.466	Constant	.803	1.55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2) 对教育、来沪时间、收入的处理同表 1。

情况下，没有偏见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交友的概率是有偏见外来农民工的 1.875 倍（即 $e^{.629} = 1.875$ ）。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比没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低，前者有交友意愿的概率仅仅相当于后者的一半（即 $e^{-0.68} = 0.5$ ）。如本地居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民工，那么社会资本可以抵消一部分偏见对本地居民交友意愿的负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时，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是社会网络中没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

居民愿意交友概率的 1.18 倍。外来农民工通过与上海本地居民更多接触,认识并结交上海本地居民朋友,社会资本更加丰富;同时也增进了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了解,从而消除了偏见。因此,模型(2)中社会网络和偏见的交互项为正的,表示社会网络中包含上海本地居民朋友的农民工没有偏见,会增加其与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其他情况不变,社会资本的丰富能使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提高为没有本地居民朋友的农民工的 1.18 倍(即 $e^{0.169} = 1.18$)。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渗透到城市当地居民中,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市民化真正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性特征(王桂新等 2008)。正是由于农民工和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相互渗透,社会资本消除偏见进而缩小社会距离的机制才得以成立。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外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改变农民工的交友意愿并进而影响社会距离,这一机制是存在的。回归结果表明,身份认同在农民工交友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显著作用:认为自己还不是城里人的外来农民工交友意愿比较低,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是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的外来农民工的 3 倍(即 $e^{1.1} = 3$)。当农民工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且没有偏见时,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减少身份认同对交友意愿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提高为原来的 1.97 倍。

本地居民和农民工通过更紧密的联系将对方容纳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来,从而丰富了各自的社会资本。双方联系更密切有助于了解对方,一方面能够消除各自的偏见对交友意愿的负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改变农民工因身份认同带来的“自卑感”而自我隔离不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状况(郭星华、储卉娟 2004)。因此,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这两种机制缩小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二) 同群效应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机制

表 4 是根据模型(3)回归分析的结果。同群效应通过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本地居民倾向于选择大多数人的选择。当周围的人不关注农民工时,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友意愿也会降低。当周围的人关注外来人时,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会提高为不关注组的 7.38 倍(即 $e^2 = 7.38$)。当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时,周围的人如果也不关注农民工,同群效应会强化这种偏见,

从而弱化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反之,如果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同群效应会抵消偏见的消极影响,使本地居民交友意愿提高。统计结果显示,当本地居民个人存在偏见时,如果其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那么同群效应能够使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提高至3.56倍(即 $e^{1.271} = 3.56$)。这种传导机制在统计时并不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的符号与假设是一致的。

表 4 模型(3)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3) - 1		模型(3) - 2		模型(3) - 3	
	B	SE	B	SE	B	SE
年龄	-.012	.011	-.011	.011	-.011	.011
年龄平方	0	0	0	0	0	0
婚姻	-.267	.356	-.273	.356	-.257	.357
教育	.015	.042	.015	.042	.015	.042
工作状态	-.021	.316	-.017	.316	.003	.316
工作性质	.241	.215	.236	.215	.219	.216
收入						
收入(1)	-.91 ***	.356	-1.001 ***	.363	-.981 ***	.363
收入(2)	-.71 ***	.28	-.775 ***	.282	-.752 ***	.282
迁沪时间						
time(1)	-.328	.295	-.353	.295	-.328	.297
time(2)	-.435	.332	-.478	.334	-.463	.335
time(3)	-.319	.356	-.351	.357	-.342	.358
同群效应	-1.40 ***	.231	-2.014 ***	.576	-1.925 ***	.583
偏见	-.571	.383	-.583	.583	-.9	.647
性别	.42 **	.186	.401 **	.187	.397 **	.187
孩子数	.05	.249	.017	.248	.031	.249
社会网络			-.234	.198	-.714 *	.444
偏见 × 同群效应			.722	.627	.63	.634
偏见 × 社会网络	.685	.479			.595	.493
Constant	1.844 *	.974	2.166	1.052 **	2.376	1.073

注:(1)***、**、*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2)对教育、来沪时间、收入的处理同表 3。

进一步观察表 2、表 3、表 4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教育对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对农民工来说,受教育水平越低交友意愿也越低,相反受教育水平越高交友意愿也越高。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比较容易,心理认同感也比较接近(王桂新等 2008)。但是,对本地居民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会越低。这是否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本地居民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优越感”造成了与农民工交友的障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2006 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从群体同质性(同群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对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资本显著影响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影响两大群体的偏见和改变农民工个人的身份认同影响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促进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第二,同群效应具有社会乘数作用,它通过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体价值判断的趋同性而影响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因为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完备时往往会参照与其关系密切的周围人的选择,所以同群效应在个人的交友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显然,同群效应和社会资本对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明显差异。社会资本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单向影响,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而同群效应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则表现为双向影响,个人受同群效应作用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周围人——所属“同群”的价值取向。统计结果表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如果本地居民周围有更多的人对外来农民工持有偏见,则容易使之疏远农民工而扩大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并乐于和农民工交朋友,会使其与农民工交友

的意愿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移的进程逐步加快,目前全国城市地区已聚集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他们虽然“常住”城市工作、生活,但却不能取得城市居民的户籍,同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与城市居民仍形成存在明显“社会距离”。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在未来 20-30 年我国城市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总结国内外人口城市化经验,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但考虑到我国社会体制的复杂性,现行户籍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决非朝夕之功。因此在未来几年内,现行户籍制度还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制约着农村人口及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完全城市化过程。本研究显示,在现行户籍制度制约下,通过改变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两大群体的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素,也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由此可得一个启示:在现行户籍制度制约下,政府应该积极实施改变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素的政策,以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应在城市制定鼓励政策,开展多种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多元化交流,增加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资本。特别要客观评价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正确认识农民工是城市人口及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引导和培养城市居民正确评价和认识农民工城市身份的“共识”,强化同群效应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正向作用。通过增加社会资本和强化同群效应的正向作用,缩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杜鹏、李一男、王澎湖、林伟,2008,《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人口学刊》第 1 期。
- 郭星华、储卉娟,2004,《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第 3 期。
- 李强,1995,《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2008,《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 1 期。
- 李英蕾、夏纪军,2009,《社会距离对自愿合作的影响——文献综述》,《世界经济文汇》第

2 期。

刘传江、周玲 2004,《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第 9 期。

卢国显 2007,《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浙江学刊》第 6 期。

任远、邬民乐 2006,《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第 5 期。

汪汇、陈钊、陆铭 2009,《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第 10 期。

王春光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王桂新、沈建法 2001,《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研究》,《人口研究》第 1 期。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 2008,《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第 1 期。

王桂新、张得志 2006,《上海农民工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5 期。

张爽、陆铭、章元 2007,《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朱力 2001,《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江海学刊》第 6 期。

Akerlof, George A. 1997,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ecisions." *Econometrica* 65 (5).

Beynon, J. E. D. 1936,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Hungarian Immigrants in Detroi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

Bell, Wendell & Robert V. Robinson 1980, "Cognitive Maps of Class and Racial Inequalitie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2).

Bogardus, E. S. 1925,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 1947, "Measurement of Personal-group Relations." *Sociometry* 10.

Canon, L. K. & K. Mathews, Jr. 1971, "Ethnicity, Belief, Social Distance and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Sociometry* 34.

Elder, G. H. Jr. 1998,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R. M. Lerner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Wiley.

Evans, A. S. Jr. & M. W. Giles 1986, "Effects of Percent Black on Blacks' Perceptions of Relative Power and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17.

Fischer, C.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Flanagan, William G. 1990, *Urban Sociology-Image and Structur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Glaeser, Edward J. Bruce Sacerdote & A. Jose Scheinkman 2003, "The Social Multiplier."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2-3).

Grootaert, C. 1997, "Social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 In World Bank, *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ullahorn, J. E. & C. P. Loomis 1966, "A Comparison of Social Distance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 (6).

- Hipp J. R. 2007, "Income Inequality ,Race ,and Place: Does the Distribution of Race and Class within Neighborhoods Affect Crime Rates?" *Criminology* 45.
- Hipp J. R. & A. J. Perrin 2009, "The Simultaneous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and Physical Distance on the Formation of Neighborhood Ties. " *City and Community* 8.
- Jasso ,G. & E. M. Milgrom 2004 *Identity ,Social Distance and Palestinian Support for the Roadmap* (<http://meyersson.com/jasMeyPal2004march1-palestine.pdf>).
- Jargowsky P. A. 1996, "Take the Money and Run: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U. S. Metropolitan Area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Johnson ,M. K. & M. M. Marini 1998, "Bridging the Racial Div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 of Gender. "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1.
- Jones ,F. L. 1991, "Ethnic Inter-marriage in Australia. 1950 - 52 to 1980 - 82. Models or Indies?" *Population Studies* 45.
- Laumann ,Edward O. 1965, "Subjective Social Distance and Urban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1.
- Ludek ,Šykora 1999, "Processes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Post-communist Prague. " *Housing Studies* 14(5).
- Logan J. R. ,R. D. Alba & W. Zhang 2002, "Immigrant Enclave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 Matthews ,V. & C. Westie 1966, "A Preferred Method for Obtaining Rankings: Reactions to Physical Handicap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 Marshall ,G. 1998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enoff J. D. ,R. J. Sampson & S. W. Raudenbush 2001,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rban Violence. " *Criminology* 39.
- Nosanchuk ,T. A. & B. H. Erickson 1985, "How High is Up? Calibrating Social Comparison in the Real World.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3).
- Payne ,M. C. ,Jr. ,C. M. York & J. Fagan 1974, "Changes in Measured Social Distance over Time. " *Sociometry* 37.
- Park ,E. Robert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Poole ,Willard C. ,Jr. 1927, "Distance in Sociology.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1).
- Putnam ,R. ,R. Leonardi & R.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ing: Civic Tradition and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1984, "The Rise of Ethnicity: Determinants of Ethnic Perceptions among Cuban Exiles in Miami.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 Sampson ,R. ,S. W. Raudenbush & F.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 *Science* 277.
- Simon ,B. ,C. Hasted & B. Aufderheide 1997, "When Self-categorization Makes Sense: The Role of Meaningful Social Categorization in Minority and Majority Members' Self-perception.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 Simmel ,G. 1964/1902,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 In K. H. Wolf (ed. & trans.) *The Soci-*

- 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 Sýkora, L. 1999, "Local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Policy in East Central Europea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In Martin Hampl et al., *Geography of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Siegel, S. & I. L. Shepherd 1959, "An Ordered Metric Measure of Social Distance." *Sociometry* 22.
- Topalov, Christian 1989, "A History of Urban Research: The French Experience since 196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4).
- Tarde, G. 1921/1890 *Les lois de l'imitation*. Paris: Librairie Felix Alcan.
- Rosenbaum, E. 1992, "Race and Ethnicity in Housing: Turnover in New York City, 1978—1987." *Demography* 29.
- Verkuyten, M. & B. Kinket 2000, "Social Distances in a Multi Ethnic Society: The Ethnic Hierarchy among Dutch Preadolescen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
- Warner, L. G. & R. M. Dennis 1970, "Prejudice versus Discrimination: An Empirical Example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 *Social Forces* 48.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 可

PAPER

Behavioral Patterns of Expert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olicy Changes in China *Zhu Xufeng* 1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a series of social policies preferential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which experts frequently participated. What roles are the Chinese experts playi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policy change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expert participation. Two key characteristics ,namely, “loss embeddedness” and “knowledge complexity” , are employed to form four type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s. Experts adopt four behavioral patter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s. Using a methodology of stakeholder analysis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policy studies based on four cases to articulat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expert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olicy changes in China. These policy cases include the new urban medical care system ,promotion of the new-typ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the new economically affordable urban housing policy ,and revocation of detention and repatriation system.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of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Migrants and Residents in Shanghai *Wang Guixin & Wu Junkui* 28

Abstract: Diminishing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is important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to urban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However how to diminish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s a tough problem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social distance and exploits how social capital and peer effect affect the social distance. We find that social capita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social distance by eliminating bia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changing self-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meanwhile ,peer effect can significantly broaden social distance by strengthening the group’s bias.